



炎帝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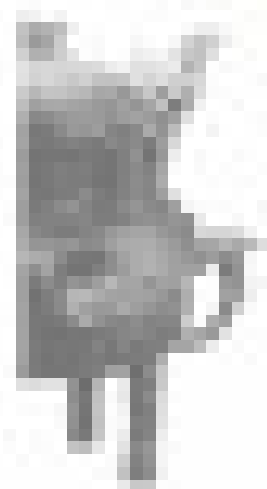
第八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王俊义

大象出版社





北平

北平



炎帝文化研究

第八辑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 黄帝陵基金会 ● 炎帝陵基金会 主办

主编 王俊义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炎黄文化研究. 第八辑/王俊义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 - 7 - 5347 - 5314 - 5

I. 炎… II. 王… III. 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579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责任校对 石更新 孙 波

装帧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69 千字

定 价 30.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

邮政编码 450000

电话 (0371) 66202901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方克立	石兴邦	韩伟	文选德
主任	张文彬	孙天义	石玉珍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才	王俊义	冯广裕	曲英杰	刘宝才
	李尚英	何炳武	邵小强	耿相新	黄爱平
	梁绍辉	曹敬庄	曾雨农	漆永祥	
主编	王俊义				
副主编	王才	曾雨农	邵小强		
编辑部主任	李尚英				

目 录

专 论

- 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张岂之\1
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 李伯谦\5

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研究

- 《黄帝文化志》出版笔谈 郑欣森 李学勤 孙天义等\17
试谈炎黄精神 鲁 淳\31
炎黄时代的和谐社会 许顺湛\38
炎黄时代的开创精神与今日社会的和谐发展 石兴邦 王震中\44
炎帝神农氏时代对和谐文化的贡献及其现代意义 邓德芳 邓玲玲\48
中华人文始祖的血亲联系与和谐文化传统的形成 张新斌\54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 红山文化在中华和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徐子峰\61
藏戏源于佛教述略 王 尧\74
金源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德金\82

思潮与学派

- 《论语·尧曰》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寻根 罗 琨\90
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散论 陈寒鸣\98
清代汉学家的“以礼代理”
——兼论对理的诠释 汪学群\113
葡河汉界,各美其美
——略论 17 至 19 世纪澳门多元一体的城市文化模式
..... 刘然玲 匡国鑫\128

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 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 周远清\142
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 任大援\146

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王俊义\158
---------------------	---------

祭祀文化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强文祥 刘宝才 邵小强\167
-----------------	-----------------

文物与考古

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龙”文化遗存源头考释	朱乃诚\171
太行山区有关炎帝碑刻的考察	刘毓庆\179

文献整理与研究

魏晋南北朝史注的特点	刘治立\187
周必大致仕后的人际网络与文献学实践	谷 敏\200
王先谦的文献学实践及其思想	王青芝\212
《香花僧秘典》辨正	秦宝琦\222

海外中华文化研究

“列国汉学史书系”序	李学勤\231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写在“列国汉学史书系”出版之际	阎纯德\233
韩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1920—1937)	张元卿 赵 莉\244

探索与争鸣

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情感纽带	
——中华龙的定位	庞 进\256

中华学人

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者——王明传略	胡孚琛\264
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记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丁伟志先生	毕 苑\272

书评与序跋

清初史学研究的力作	
——《清初私家修史研究》序	黄爱平\281
《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序	耿云志\283

学术动态

2007 年“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曾雨农 王震中 曹敬庄 \287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综述

..... 湛 风 \294

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张岂之

一、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关于炎黄时代,即中华文明的起源,这是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或偏重于史前文明起源时期,或着重研究中华民族在今天应如何继承发扬民族精神,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前者着重于“源”,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于“流”:它们的关系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我们今年的祭陵学术活动,将重点放在现实的考察上,即研究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弘扬中华文化,使其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这是当今时代对我国提出的重大课题。从世界格局来看,21世纪初更加显示出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从经济角度考察,可以看到,我们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和影响更加紧密。从科技层面分析,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遍使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是过去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在国际上和平崛起,不仅要有很强的政治国力、军事国力、经济国力,而且要不断提高文化国力,充分认识到国家软实力——文化的重要性。

我国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为民族复兴提供制度与规范的保证;而文化复兴又为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可见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文化的实质是什

^{*} 本文是作者于2008年4月2日在西安召开的“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么?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强调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从思想史看我国历史文化的特点

在上个世纪,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为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建立国家组织时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可称之为“早熟”文明,走着与西方古希腊文明不同的发展路径。还有,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了解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不能离开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这两个重要的视角。中国历史尽管有战乱分裂,但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在国家统一的背景下,产生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汉、唐文明。这告诉我们:中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由于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今天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体现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从总体上看,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以探究社会问题为主,有明显的经世致用倾向。从汉代起,儒家的经学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皇权统治以经学为教本,讲尊卑贵贱不可僭越,不同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责任,应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以保持社会的稳定。经学对特定时期(汉代至清末)社会和个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个人道德修养、立身处世,到社会责任、实现理想,以至如何追求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等等,都有所论述,是兼容性、适应性以及反映宗法等级制的思想体系。当时以经学治天下,颇有成效,儒学也随之发展。西汉有“五经”,东汉时为“七经”,唐时有“九经”,宋时成为“十三经”。这些被称为“经天纬地之作”的经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教材。

经学并不排斥其他学问。经学与史学相联系,经过孔子修订的史书《春秋》,是最早的“五经”之一。在古人看来,史书应体现经书的基本理念,而史书中的灵魂也就是经书的义理。至于诸子百家之学以及历代文人学士的创作,被认为是从不同方面发挥经书义理的著作。因此,在文献学意义上,经、史、子、集便成为所谓传统“国学”的框架。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经学对民间也有很大影响,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和家庭血缘关系的价值准则,倡导仁、义、礼、智、信,以规范平民百姓的思想行为。总之,经学中有维护皇权的正宗思想,宣扬以官为本、以吏为师,同时也有制约皇权的以民为本、以贤者为师的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观念文化中,继承传统又不断予以新的阐释,以适应时势的变化,又善于吸收融合不同学派以

及域外的思想文化，以充实自身，由此形成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

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并不限于经学，而是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诸子百家之学”。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在道德伦理思想上有巨大贡献，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仁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丰富内容，其中充满智慧和洞察力，对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我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多种理论体系，是在春秋战国这五百年里。其观点之繁富，辩论之激烈，反映出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学派约有十家，他们“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百家争鸣，相反相成，惟其如此，才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

三、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要有“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应特别注意“精神”二字。如果离开精神文明这个主轴，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里所说的“精神”，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文化中渗透着的精神是什么；二是我们今天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国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限于时间，我不能在此作全面介绍。至于第二个问题，即我们以怎样的精神来对待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这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请与会学者发表高见。

诸位光临西安，使我想起关学始祖、北宋时大思想家张载，他向当时的学人提出这样的历史任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北宋时思想家们复兴儒学、建立理学的具体历史环境，用今天的时代精神诠释张载的话，仍然有精神鞭策的作用。

我还想提到，我国学人自古至今在精神世界里有一共性的存在，这就是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他看来，道德教化不能普及于天下，这是他的忧思所在。老子有“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的名句，主张摒弃人为“文明”而不用，使人保持淳朴自然的品质。孟子毕生宣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

^① 《张子全书》卷十四《近思录拾遗》。这种表述比较流行，但还有不同的说法，字句稍有差异。据《张子语录》记载，原文为“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见《张载集》，第320页，中华书局，1978年。

下》)的人生哲理,认为忧患使人得到磨练,足以担当重任,而安乐却使人沉迷,不思进取。庄子名言“哀莫大于心死”(《庄子·田子方》),道出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在我国古代观念文化中,忧患意识具有警世育人的作用,特别是在国运昌盛或个人事业有成的时候,更加需要冷静、谦和的心态,不忘危难,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总之,弘扬中华文化,主要指从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中吸取不竭的精神动力;而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活动中,虽然不能缺少应有的物质内容,但更加重要的是,文化设施要有精神内涵,具有净化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这是全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不但要做好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而且要关注现实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陕西省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西安曾经是十三个朝代的建都之地(即长安),这里应当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多作贡献。为此需要吸取历史和现实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宝贵经验,形成可以操作的计划。例如,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怎样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再如,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什么?我个人体会,这可能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因此,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是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紧密联系的。作为我国西部的省区,陕西省应切实做好九年义务教育,重点建设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还有,陕西省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其中具有文、史历史传统的高校,要注意培养研究中华文化的高质量的专门人才,重视在大中小学普及优秀民族文化的工作。再,根据文化部向社会公布的2008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点的规定,准备为西安申办“文化遗产之都”,同时做好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相应地在研究上更上一层楼。做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的工作,陕西省考古学界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需要提升与总结。系统整理文化典籍,进一步开拓视野,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质,促进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加强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等。这些建议是否妥当,以及应有怎样的思路,采取什么步骤等,请各位学者提供宝贵意见。总之,做好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工作,就是对人文初祖黄帝最好的纪念。

(作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考古学视野的三皇五帝时代^{*}

◇李伯谦

追溯中国远古时代,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都不能不提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的三皇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自战国直至清末民初,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三皇五帝是神圣的化身,只可顶礼膜拜,不可有丝毫怀疑。然而,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疑古思潮,又对三皇五帝彻底否定,好像他们都是毫无根据的杜撰。将三皇五帝加以神化,固然不可取,但对文献中的这些记载彻底否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认为,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将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加以整合,进行综合分析,是有可能对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三皇五帝时代作出正确解读的。

一、三皇五帝时代是在我国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古史的开篇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头脑中固定的古史观。这种古史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除了一代一代口耳相传,还缘于古代文献的记述。

在先秦文献中,三皇分别见于《易经·系辞下》、《庄子·盗跖》、《山海经》、《左传》、《竹书纪年》、《韩非子·五蠹》、《列子》等,五帝分别见于《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不过,各书所记并不完全相同。许顺湛先生大作《五帝时代研究》^①对此作过系统梳理,在其第一章第二节中,对三皇共列出八种说法,即伏羲、神农、燧人;伏羲、神农、祝融;伏羲、女娲、神农;伏羲、祝融、神农;伏羲、燧人、神农;燧人、伏羲、神农;伏羲、神农、黄帝;燧皇、伏羲、女娲。在其第二章第一节中,对五帝列出五种说法,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禹;轩辕、少昊、高阳、高辛、

^{*} 本文系作者根据2007年10月16—18日在长沙举行的“炎黄精神与和谐文化”炎黄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补充修改而成。

^① 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本文写作时主要参考了该书,以下不再一一注出。

陶唐、有虞；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这种情况，既可能缘于后人有不同的古史记述系统，更可能是当时存在着众多类似三皇五帝那样的族氏及其领袖人物的反映，例如，除了三皇五帝，见于古代文献的尚有有巢氏、太皞氏、共工氏、蚩尤、三苗等。司马迁对上述记述当然是看到过的，在他整理资料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按照从严掌握的标准，舍弃了许多他认为“不雅驯”的史料，仅保留了有关五帝的记载，而对于五帝的不同说法，也仅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说撰成《五帝本纪》，作为他创建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开篇，而保留下来，流传至今。

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传说，我认为都可以将三皇五帝作为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待。关于三皇，我比较倾向伏羲—燧人—神农的排序。所谓伏羲，按照《易经·系辞下》的说法，伏羲氏时“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应该是指历史上的渔猎时代。所谓燧人，按照《韩非子·五蠹》的说法，燧人氏时“钻燧取火，以化腥臊”，改变了以往“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的状况，是指历史已发展到了学会用火的时代。所谓神农，按照《易经·系辞下》的说法，神农氏时“斲木为耜，揉木为耒”，已经发明了农耕，但“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庄子·盗跖》），是已经发明了农业，学会了农耕，但仍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关于五帝，我认可司马迁的排序。从《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来看，五帝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承关系，五帝时代已是父系家长制社会；五帝时代有着众多的或服或叛的“诸侯”国族；五帝时代有着筑宫室、制嫁娶、作舟车、作弓弩、作棺槨等众多发明创造；五帝时代社会已发生分化，争斗激烈，战争频仍；五帝时代已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有了国家的雏形……

二、疑古思潮对传统古史体系的破坏与走考古学之路 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任务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众多记述，且由大史学家司马迁经过整理而形成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但随着西学东渐，在其影响下，20世纪初在中国开始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疑古思潮，将矛头直指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古史体系。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他的有力支持者和后盾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和钱玄同。顾颉刚，江苏吴县人，1912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哲学系，1920年毕业留校，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在胡适影响下，他由疑古书进而疑古史，他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可谓是当时疑古思想的代表和核心。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主要是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顾颉刚说，“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说，“如舜在孔

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显然,在顾颉刚看来,传统的“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历史都是后来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是靠不住的。1926年顾颉刚把他们辨别古史真伪的论文和来往信函编辑成《古史辨》第一册公开出版^①,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在《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写了一篇序言,洋洋洒洒有5万多字,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疑古思想的由来和对有关古书古史的观点。《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在学术界犹如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反对者有之,拥护者更多。一时间,传统的古史体系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古书多伪书,由古书抽绎出来的古史当然就靠不住,那么,怎样才能把从远古到上古这么长的一段历史搞清楚呢?这是当时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1924年末,李玄伯在《现代评论》一卷三期发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顾颉刚看到李玄伯的文章之后,即于第二年即1925年初在《现代评论》一卷十期上发表《答李玄伯先生》,说:“读到李玄伯先生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非常高兴。李先生所说的‘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确是极正当的方法。”为什么当时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把解决古史问题的目光投向考古学?这是因为运用考古手段挖出来的遗迹和遗物才是研究历史真实的史料。这里说的考古学,并不是宋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而是指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的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现代考古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成立及于当年开始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可以作为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

由于疑古学派对传统古史体系的破坏和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的传入,走考古学之路遂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同认识,成为史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三、考古学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野外发掘,过去都是外国人在做。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由李济任组长,当年即到安阳小屯发掘殷墟,这是中国的专业学术机构主持的第一次发掘。这两次发掘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目的都很明确,西阴村的发掘是想寻找文献上记载的黄帝时代的遗迹,小屯的发掘是想寻找甲骨文和商朝的遗迹,都是为了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小屯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连续进行了15次,一直没有停顿。殷墟的15次发掘,发现了商王的宫殿基址、商王的陵墓、甲骨文和青铜器、玉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恢复了殷墟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发现了更多的遗迹和遗物,建立了殷墟年代分期标尺,弄清了遗址的范围和规模。这些工作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竹书纪年》“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是正确的,商朝后期的历史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已不再是所谓的传说时代。而且也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材料证明商代后期已是具有相当发展程度的文明社会,已经有了国家。

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之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于1933年至1937年由徐旭生主持,苏秉琦具体实施,对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了发掘,揭开了探索先周文化的序幕。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虽然考古工作基本停止,但在抗日最艰苦的年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石璋如还于1943年到西北作了周人遗迹的调查。

1949年,新中国建立,很快成立了科学院,组建了考古研究所。考古所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派郭宝钧先生恢复殷墟的发掘,发现了武官村大墓。武官村大墓中大量殉葬人的存在,成为当时商代社会性质讨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材料。周人都城遗址周原、丰镐的调查、发掘在50年代也已开始,迄今不仅建立了丰镐西周文化、周原先周文化的年代分期标尺,还基本明确了各自的规模,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和贵族大墓,出土了周人甲骨文和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证实了周王朝的存在,周王朝是比商王朝文明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

从1950年开始,我们国家经过时间不长的恢复便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这段时间内,一是全国各地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使人们由过去只盯着中原地区转为开始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地域,开始思考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和分区问题;二是主动为重建中国古史而开展的考古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发现了郑州商城和二里头遗址。

郑州商城发现于1955年。在此之前,1950年在郑州发现的二里岗遗址,经过研究已被确认为是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不久就发现了郑州商城。当时发现的郑州商城周长7000米,在城内东北部有宫殿建筑基址,在城外东北部和南关外有铸铜作坊遗址,城内城外还都发现有中小型的墓葬,且有铜器窖藏出土。后来又发现了外城,其规模之大更是当时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及。经过对出土遗迹、遗物的研究,学者们不仅对郑州商代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期,而且还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探讨了其性质。当时主要一种意见是主持发掘的安金槐先生提出来的,认为是商王中丁所迁的囂都。后来,又经过讨论,北京大学邹衡先生提出

来的郑州商城亳都说越来越成为主流的认识。按照文献记载,亳是商汤灭夏前最重要的基地,灭夏后又回到亳地建都。亳都说也好,隰都说也好,它都早于殷墟,因此郑州商城的发现和被确认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不仅商代后期的历史是可信的,商朝前期的历史也是可信的,整个商朝的历史都是可信的。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夏商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1959年,年届古稀的徐旭生先生带着助手赴豫西晋南调查夏墟,发现了这处遗址,当年就开始了发掘,至今仍在继续,并不断有新的发现,不仅有青铜器、玉器,还有宫殿基址、贵族墓葬和宫城等遗迹和遗物。最初徐旭生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文献中提到的商汤所建的西亳,并得到了许多学者包括主持或参加过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各位先生的支持。后来又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特别是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以后,人们的认识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的意见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其性质的被确认,证明商朝之前确有一个夏朝,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夏史是可信的历史,夏为传说史的说法在大量事实面前被彻底否定了。

上世纪从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经过“文革”的暂时停滞又逐步进入高潮。这时期,围绕重建中国上古史体系,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密县(今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现场专门召开了一次夏文化讨论会。会上,主持发掘的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安金槐先生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可能即文献上讲的“禹都阳城”的阳城,并以附近发现的战国城址中出有“阳城仓器”陶文为证。但多数人觉得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太小,面积仅为100米×100米,不大可能是禹的都城。对于究竟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会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三、四期是商;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一期是夏,二至四期是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是夏,四期是商;邹衡先生提出郑州商城亳都说,认为早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此次讨论会,虽未对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形成共识,但夏文化研究的对象被锁定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夏鼐先生在会上提出的夏文化应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的定义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应是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芝荃先生对密县新砦遗址进行了试掘,发现了时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期遗存,为探索早期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因试掘面积太小,遗物不太丰富,未能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崇山北麓,当时发现有贵族墓地,出土了陶鼓、背壶、双耳罐等许多彩绘陶器和玉器。由于襄汾和临汾距离很近,而临汾即文献上